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



毛主席语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目 录

绪 言	1
陈胜 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革命战争	11
绿林赤眉大起义	33
黄巾大起义	52
隋末农民大起义	65
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革命战争	80
两宋时期的农民大起义	100
元末红巾大起义	119
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革命战争	136
清代中叶各族人民大起义	165
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简表	185

绪 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早在四千多年以前，就从原始社会跨进了奴隶社会，在这一千五百多年的奴隶制的历史阶段里，奴隶和平民反抗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阶级斗争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因而在公元前四七五年，我国历史进入到封建社会。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史。每次农民革命斗争，都是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愈演愈烈。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与农民革命战争，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长，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遵循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我们应当着重学习与研究中国的现代史和近代史；也要重视学习以农民战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仅要熟悉祖国的今天，也要知道祖国的昨天和前天。学习农民战争史，能够使我们了解封建社会阶级

斗争的具体内容，和明了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与总的趋势，从而加深对农民革命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理解。这对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服务于现实的阶级斗争与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的反动谬论，均具有重要意义。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是在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血腥统治和残酷剥削的情况下发生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革命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秦朝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使广大农民处于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陈胜、吴广才率戍卒“揭竿而起”。唐末农民革命战争则是由于惊人的土地兼并与繁多的苛捐杂税，使“贫者无立足之居”、“无米复无柴”，黄巢才带领贫苦农民奋起反抗。明末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战争，也是因为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使农民流离失所，造成“乡乡几断人烟”，李自成才高举义旗领导广大农民南征北战。许多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事实，展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农民群众，面对封建统治者剥削和压迫的血泪斑斑的现实；与地主阶级“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在政治上要求平等、经济上要求平均，充分地体现农民起

义的“等贵贱、均贫富”的政治纲领里。从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唐末农民革命领袖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直至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粮”等革命口号为止，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农民革命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对孔孟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和他们维护的宗法等级制度的一个沉重打击。广大农民群众在“均贫富”的革命思想指导下，对封建统治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铁的事实给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所宣扬的农民群众是没有独立思想的“乌合之众”等无耻谰言，以一记响亮的耳光。是对孔孟鼓吹的“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以有力地批判。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秦末农民起义的另一名领袖吴广，利用“篝火狐鸣”喊出“大楚兴，陈胜王”；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在传播“太平道”的同时，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宋代农民起义领袖方腊在传播摩尼教的过程中，广泛宣传“法平等，无有高下”；元末红巾起义军宣传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直到明末李自成大起义编出的“金江山，银江山，闯王江山不纳绢”等通俗易懂的歌谣，都起到了革命的动员作用。这充分说明起义农民懂得推翻地

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大造革命舆论的重要性。当然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受生产地位与生产规模的局限，农民不可能建立科学的革命理论。因之，这种革命舆论的宣传从农民最迫切的愿望出发，采用民谣、歌谣和寓言等形式，虽然有些与传播的宗教相结合，披上迷信的外衣，但却成了发动起义的工具，迸发出革命的光辉；广大农民利用宗教作为联合自己力量的手段，进行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不能不说还具有某种策略上的意义。

“世界上的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农民革命战争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地主阶级的政权，因为地主阶级之所以成为压迫农民的统治阶级，就是由于它们掌握着军队、监狱、法庭等国家机器，实行地主阶级的专政。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者，利令智昏，以为他们掌握了反革命的“暴力”，就可以为所欲为，对广大劳动人民就可以任意宰割，甚至梦想他们的统治会千秋万世，可是历史的客观规律却粉碎了这群丑类的痴心妄想。恩格斯指出：**“被统治者和被剥削者在任何时代都比统治者和剥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暴力总是在前者的手里。”**被统治被剥削的贫苦农民，当意识到封建地主是其不共戴天的仇敌的时候，便发动起义进行坚决斗争，这才是真正的暴力，封建皇帝的王冠之所以一顶一顶的落地，封建皇朝的政权

之所以一代一代的崩溃，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关系之所以一次一次的被砸烂，都是农民革命斗争的结果。

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斗争的革命道路，与所有的革命斗争一样，并不是平坦笔直、一帆风顺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的理论，同样适合于农民革命战争。因为农民革命战争，有它叱咤风云、波澜壮阔的斗争局面；也有表面平静的低潮时期，虽然结局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反封建的斗争却越来越深入。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证明：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农民革命战争已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

历代农民革命战争，在浴血奋战中，都建立了农民的革命政权。如陈胜、吴广建立的“张楚”政权，黄巢建立的“大齐”政权，红巾军建立的“大宋”政权，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等，都是贫苦农民在革命斗争中所建树的不朽的历史功勋。农民革命政权建立之后，颁布了一系列代表农民利益的“政纲”，制定了许许多多打击封建地主的措施。如黄巢领导的农民军，在攻下长安时“见贫者往往施与之”，而对封建官吏则“得者皆杀之”。起义农民爱憎分明的革命行动，迫使地主阶级的文人也不得不发出“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哀鸣。对封建地主的打击，就是对贫苦农民的解放，在明末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起义军还未到达时，在广大农民中便传诵着“早早开门迎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的歌谣。这充分证明：“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起义军还制定了“均田免粮”、“三年不征”的政策，在河北、山西和山东的部分地区把地主占据的土地、房屋和耕牛分给农民，并且使封建的“纲常法纪，扫地无余”。这就体现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专政，这也说明农民革命战争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是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却抛出反动的“让步政策”论，鼓吹什么：“每次农民战争的结果，时常迫得新兴的朝代不能不对农民给些让步，使农民得以稍微休养生息。因而把生产力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推动了一步。”这纯粹是无耻的捏造。因为封建地主的剥削阶级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在农民革命战争失败后建立的封建王朝是旧王朝统治的继续，所以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恢复已失去的“天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步一步地夺回它们在农民革命战争中所丧失的一切，这是地主阶级制定统治政策、实行反攻倒算的出发点。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把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说成是对农民阶级的“让步”，其罪恶目的就

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

农民战争史，又是封建社会劳动人民反孔斗争史。反孔斗争，是在它们反对奴隶制残余、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秦末陈胜“奋臂为天下倡”，到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所提出的一切斗争口号和革命纲领，都沉重地打击了儒家思想借以存在的反动基础，从根本上批判了儒家的思想观点。反动的地主阶级为了维持日趋没落的封建统治，曾把孔老二抬到吓人的高度，把儒家思想上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使儒家思想更加腐朽和反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农民战争不但猛烈地冲击了儒家的理论基础，而且直接地声讨了这个反动地主阶级的“圣人”——孔老二。金代的红袄起义军，曾烧毁了曲阜的孔庙，使“殿堂庑廊灰烬什伍”；明中叶的农民起义军，再度攻占曲阜，驻军孔庙，把《四书》、《五经》扔进水池，砸碎了尊孔祭器，将孔门血统的世袭大地主扫地出门；明末农民战争的兵锋所至，使各地尊孔文庙“遗迹鲜有存者”。几千年来，以农民战争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猛烈地冲击着地主阶级维护统治的思想堤坝。无数事实充分表明，劳动人民是反孔斗争的主力军。

在农民起义军内部，曾出现过复辟反复辟、投降

反投降等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在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反映。

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是农民和地主之间进行的两个阶级的大搏斗。封建统治者对农民革命采取武装镇压和政治欺骗（包括招安）的反革命两手，企图达到消灭农民革命和维持其封建统治的目的。在封建社会初期，奴隶主残余势力，乘机钻进农民起义军中，大搞奴隶制复辟活动。在地主阶级内部由于派系斗争等原因，有的地主分子伪装革命，混进农民革命队伍中，还有的农民起义军领导集团中的个别成员，被剥削阶级腐蚀拉拢蜕化变质或屈服于敌人的武装压力而投降变节。他们在起义军内部大搞封建复辟和投降等罪恶活动，同外部敌人遥相呼应，形成一条反革命的阶级投降路线。因此，农民革命，一方面要用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同时还要不断揭露和打击剥削阶级的政治阴谋。特别是同隐藏在农民革命内部的反动势力进行尖锐复杂的斗争，坚持农民革命路线。这就出现了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复辟反复辟、投降反投降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农民革命战争史，曾无数次的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伟大真理。当农民起义军中的革命路线，击败了复辟、投降路线之后，就促进了农民革命的飞快发展，加速了封建王朝

的灭亡。反之，就会把革命引向失败。这是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给后代留下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我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并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正因如此，农民革命斗争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然而这种对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与对反面经验，即深刻教训的认识也是分不开的。农民革命战争，虽然把封建王朝一个一个的摧毁了，但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政党作领导，从而被地主贵族利用了去，当作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是封建社会历史上农民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留给后代的最基本的教训。

农民革命战争的结局虽然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但是农民革命的火把也总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进行前赴后继地英勇斗争。学习起义领袖和农民群众敢于向地主阶级挑战、高举革命的造反旗帜的斗争精神，就更能激励我们的革命斗志，勇敢地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者同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样，从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出发，极力歪曲和诬蔑农民革命战争。把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农民贬为“盗贼”，而把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称为“英雄”，这完全

是对历史的颠倒。我们一定要遵循关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伟大真理，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我们必须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斗争，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坚持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陈胜 吴广领导的秦末 农民革命战争

公元前二〇九年，在中国历史上，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制和国家的统一，坚决实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路线，同代表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儒家复辟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推行了有利于国家统一的郡县制，在全国确立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他还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等，使全国有了大体相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奠定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基础。这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说：“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但是叛徒、卖国贼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儒反法，对秦始皇进行恶毒的咒骂。充分的暴露了他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用心。

毛主席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新兴地主阶级毕竟是一个剥削阶级，秦始皇毕竟是一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来说，它们在推进封建化的过程中，同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使用暴力镇压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这是进步的。另一方面也使用暴力对广大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这是由它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从地主阶级产生的那一天起，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已经开始。秦统一后，伴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巩固，农民反抗地主的阶级斗争，必然是日渐激化。

新兴地主阶级，虽然反对了奴隶制的残余势力，在客观上有利于广大农民摆脱奴隶地位，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由于它们带有剥削阶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使它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同奴隶制彻底决裂。新兴的封建制代替腐朽的奴隶制，毕竟是一种剥削制

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同时，它又是刚刚从奴隶制脱胎而生，其发展也不够完善，因此，封建制度本身，保留了相当浓厚的奴隶制因素。

毛主席指出：“**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为了巩固和强化地主阶级的统治，封建国家用各种刑法，一方面用来镇压奴隶主的复辟活动，同时也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他们制定了割鼻、砍脚、杀头、车裂、活埋、灭族等十几种刑罚，企图用这种办法，把广大农民永远置于它的奴役之下。

秦朝地主阶级，疯狂地掠夺土地，迫使占有一小块土地的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沦为给地主“佣耕”的雇农，有的沦为以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农。租种土地的农民，要向地主缴纳收获物的一半以上作为地租。广大农民除了受地租和劳役剥削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沉重的赋税和承担无偿的徭役，去养活一大批剥削和压迫人民的贵族、官僚和军队。秦朝统治集团仅在修筑阿房宫和骊山墓（秦始皇墓）这两项工程上，就强迫民工和刑徒七十万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劳动人民）从事繁重的劳役，不知有多少劳动人民，在这种奴隶式的劳动中，累得骨断筋折，甚至惨死在荒山蔓草之中。广大劳动人民，在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下，经常过着“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的奴隶生活。有

的甚至“嫁妻卖子”，再度沦为奴隶。

新兴地主阶级，虽然给奴隶主残余势力以沉重打击，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将奴隶制残余势力扫除干净。不但秦朝政府保留了许多官奴婢，特别是六国贵族，有的还占有土地，采用奴隶制的剥削方式，六国的大工商奴隶主们，更利用手中的“余财”，大搞奴隶制经营，有的甚至成为“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的富豪。广大农民除了受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外，还受到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威胁，随时随地都有沦为奴隶的可能。至于奴隶和奴隶的子女，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被当作会说话的“牛马”，有时还被装在木笼里，放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甚至被任意杀害。

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它们时刻梦想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复辟奴隶制度。在公元前二一〇年，以赵高为代表的奴隶主残余势力，发动了沙丘反革命政变。赵高是埋藏在秦朝封建政权内部的野心家。他原是赵国贵族的后代，因为“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由于他善于耍两面派，欺骗了秦始皇，并得到重用。在公元前二一〇年，秦始皇巡游到沙丘时，因病去世，野心家赵高，利用掌管皇帝印玺和起草机要文件的职权，诱骗胡亥、威胁李斯，发动了沙丘反革命政变。赵高政变后，控制了秦朝中央政权，立胡亥为秦二世，用儒家路线